

学历·学力

黄阿忠

在当下这个社会，你的学历相当重要，好像是处处都要碰到这个问题。如若招聘、求职，到人才交流中心推荐自己等，都必须自报家门，告诉他们，什么学校毕业、是什么学历，若是到了某单位、机构，或者是某学校，碰上评职称、考核科业绩、评奖金、排座次等等，又摊上了学历。

二十几年前补文凭的情形历历在目，那年代的成人教育，通俗叫法为“夜大学”，相当热门；大家白天上班，晚上读书，当然有时也借用白天，一时蔚然成风。撇开渴求知识，补文凭，获取学历恐怕是读书的重要原因吧。

话说回来，学历也不仅仅是为了加薪、升职等。学历是一个人学习的经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乃至研究生、博士生是一个过程、流程，记录这段学习自始至终的经历，我们叫它“学历”。“学历”很重要，它系统地归纳为文学、哲学、数理、自然科学等等，把他们分成一段段、一块块载入“经历”，一直到最后细化的“专业”。在这条路上走了一遍后，你就会有很多感知，甚至感悟。学历是告诉大家，你在哪条道上走的“流程”，你又在哪一段停了下来。

话分两头，事物都是两面的。从“学历”这条路上走来，成就事业的大有人在；然不走这个“流程”的，最后成为一代宗师的亦举不胜举。鲁迅、巴金、陈寅恪、沈从文、齐白石、启功等，都是学历很低的，有的甚至最高学历只是小学。还有前清科举考

试落榜的，如曹雪芹、胡雪岩、李笠翁、顾亭林、金圣叹等，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是状元没考上，没“学历”的。这样看起来，因为有那些没有学历而成大家的案例，好像“学历”变得不重要了，有时甚至觉得不去拿学历会更好。其实也未必，很多事情都是有综合原因达成的，无学历而成事业业的个案不能概全。

我觉得不必去纠结有无“学历”，关键是在获得学历后，怎样去用你的“学历”去指导你新的发现，为你在生命科学、工程学、物理学、医学、文学、艺术、音乐等领域作出更大的贡献。忽然发现，要在这条攀登理想的道路上再往前迈进一步，光靠“学历”，是远远不够的。那么，我们继续前行要用什么来支撑呢？

如果要攀登高峰，需要的是“学力”。学历代表了你学习的经历，而学力则是在你学习后化成的力量。“力”是综合了众多的修养而获得的；“力”是融化诸多元素而铸成的。小时候读过一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小说，懂得了力量来自毅力，顽强的精神，常常告诫自己不要虚度年华，碌碌无为。现在想起来，和学力的蓄积很是相像，“学力”不是坐享其成的。钱三强有学历，北大、清华至法国留学，而成就他的在于“学力”。在综合了众多核物理依据，经过考察、实验……，才有a粒子、质子的论文立于世界之林，最后由于他顽强的精神和“学力”，为国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再看齐白石，他是没学历的，但是他的

“学力”了得。看看齐老先生是怎样蓄养他的“学力”。早年，他为谋生学木匠，不做大木匠（造房子、扛大木的），改学细木匠（雕花、刻板的），这雕花和绘画艺术沾上了边。后来拜老师学诗词，而后从芥子园入手，学画，并愿在青藤、八大、缶翁三家做“走狗”轮流转，而后“北漂”，不随波逐流“宁可饿死京华”……遂成大家。齐老先生这一步一步向前，靠的是顽强的意志，和坚实的力量，这也就是我们说的“学力”。由此也可以看到，齐白石的“力”，是因为综合了诸多的元素而得到的。

比方我们去登山，黄山或者泰山，先是坐大巴到山脚，而后解散各自攀登，假设没有缆车，接下来的情况是，一车的人，有的不去登山，而在山底转；有的爬到半山腰，脚力不支，跑不动了，往回走；有的则靠力量和毅力登上了顶峰。这个大巴好比一所学校，从某地出发经某某地、站，最后到山麓，这就好比是“学历”，某地、某站又好比某个学习阶段；而分散登山要有脚力，又好比“学力”。那么，我们凭“学历”（大巴）能到目的地，但只是山脚，而如果没有“学力”（脚力），就到不了高峰。客官若要相问，如何增强脚力？曰：多锻炼，多蓄养。

以此例推及，登得越高，看得越远，四面环顾，看到的景色也多；而半山腰者，则见去半，然山脚者，则所见亦众见也。

要说滋养“学力”的办法很复杂，一时很难表述。“学力”牵涉的方面很多，而且每个人要补的“力”也各有不同。其实，“力”又很简单，用目光、目标、追求、精神、毅力十个字概括足矣，而所有这些，都必须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来支撑。

学历很重要，然你有“学力”吗？

肠粉

西坡

到粤式茶餐馆不点肠粉，仿佛到川菜馆不点麻婆豆腐。

肠粉在广东人眼里平常得就跟上海人吃碗小馄饨一样，谁会拿它当回事儿地咋咋呼呼昭告天下？“早上咱可是吃了肠粉啦”——试着瞅瞅周边的人看自己的眼神，一整天感觉都不好了。

但在上海就不一样，吃肠粉是件很庄严的事儿。点肠粉前，总得了解一下它是怎么回事；退一步说，功课没做好，临时抱佛脚的话，瞄一眼隔壁桌的肠粉长啥样儿绝对需要；在本地，不作特别的说明，“肠”，往往就代表了“大肠”，相当多的人好那一口，也有相当多的人忌讳得很。

即使有所好，也得注意点——同样在广州一带，还有一种小吃，叫粉肠，两者容易混淆。

粉肠是中国粤港地区的传统名菜，似乎又分成两类：一是用猪肉、淀粉等混合后灌入肠衣煮熟，类似火腿肠；一是以猪肠为原料制成，类似上海人说的“圈子”。对于那些“肠过嫩”的吃货而言，前者还可接受，后者只好敬谢不敏了。

肠粉与粉肠当然异趣，好比“吃紧”和“紧吃”之别（旧有“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之谓）。

肠粉虽然标榜“肠”，然而不过是个幌子；打着“猪肠”的名义，做着与“猪肠”不相关的事情。这里的“肠”，是“像猪肠子那样”的意思；这里的“粉”，自然也不是“面粉”的粉、“涂脂抹粉”的粉，特指把大米碾碎至粉状并加工成米制品。东汉刘熙《释名》曰：“粉，分也。研米使分散也。”说得够清楚了。肠粉是米制品，无疑。

肠粉看上去像什么？吃过的人，可以飘过，没有吃过人，我给出一个不很恰当的比喻——用像豆制品柜台卖出的粉皮那样的材料，里面裹入各色馅料，然后不是油余而是用蒸的方法做出来的“春卷”。太拗口了不是？我也是被逼无奈，走投无路，理不屈而词已穷啊。

但据说，当年客家人祖先南迁之后，因南方不种小麦，没有面粉，春卷皮就做

不成，他们就采用大米磨粉制成皮子。从此，肠粉代替了春卷。

看，还真有人给我那蹩脚的比喻作背书哩！

许多人可能对肠粉的皮子为什么是透明的感到好奇。这其实是一种技巧：米浆里掺进一定量的澄粉（生淀粉）而已。小小的脑洞开窍，令人感到成功来得太快。

肠粉的皮，老广有许多的讲究，什么“窝篮式”（米浆摊在竹匾上蒸），“布拉式”（米浆摊在布料上蒸），“抽屜式”（米浆摊在木质或铁质的蒸格上蒸）……你要较真你就输了，它们的区别，真比跳高是跳过20厘米高的杆还是30厘米高的杆的差距还小。

肠粉的馅，各式各样，猪肉、牛肉、虾仁、鸡蛋、鱿鱼丝、绿豆芽、青菜粒……不怕做不出，就怕想不出。

吃肠粉要蘸（浇）作料，酱油、芝麻酱、花生酱，甚至请来各种汤汁亦可。我因为对花生酱特别偏好，往往不假思索地锁定了它，除非出现了别一种情况——肠粉的馅，是用刚出锅的油条或薄脆做的，那得改成生抽加麻油。

我最喜欢用油条或薄脆做馅的肠粉，外软里脆，外绵里松，外滑里韧，外白里黄……常常如同看电影看到自己喜爱的角色安迪从管道里钻出最终逃离肖申克监狱那一刻，吃得开心。

美食家蔡澜先生十分赞赏南国百年老店“泮溪酒家”的“鸳鸯靚粉”，认为它“绝对不是普通肠粉可比，一边甜一边咸，前者本身比白糖糕更美味，蘸花生酱吃；后者中间已加了榄角，蘸的是以榄角磨成的酱末，是点心中的绝品”。好的，我记下了。

广深地区做的肠粉，看上去糊哒哒的，像下烂的馄饨（恐怕是追求皮薄之故），让人视觉感受不太舒服；上海茶馆里的则整齐饱满，精神十足，皮子明显厚实。撇开对正宗与否的考量，我稍微偏爱“海派”。

肠粉的来头，坊间传说颇多：源自唐代的慧能、清代的乾隆，或者有个厨子怎么不小心阴差阳错……

信则有，不信则无。你是吃肠粉，又不是去“群艺馆”，管他呢！

四月舌尖野“草”香

赵染芹

人间四月天，江南乡下老家遍地长宝，连“野火烧不尽”的茅草和烧锅扎手的野生刺藤，都能生长出可解馋的纯天然“美食”——草芯和刺藜。

春天的茅草极像站立之“矛”，躯干笔直，顶部颇似锋利的剑尖，被一长一短两片叶子护卫，虽没玫瑰的调姿弄影、妩媚鲜丽，却也显得威风凛凛、顶天立地。茅草，又称“白茅”，为禾本科多年生植物，生命力极强，无论荒无人烟的山巅，还是热闹非凡的路边；无论烈火焚烧的荒坡，还是刀割锄铲的田埂，有泥土的依托，茅草就能疯狂生长。不过，当时的孩子们，欣赏的不是它“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超强生命力，而是它孕育出的纯天然“口香糖”。

30多年前的春耕季节，小屁孩无论“单遛”还是聚在一块，总爱往长满茅草的山边、田埂转，见到“怀孕”的茅草，就把“黑手”伸过去，捏着草尖轻轻往上一提，随着细若蚊吟“叭”的一声，一枚原生态的“口香糖”就到嘴边。刚开始，抽出一支茅针，宛如从口袋掏出一片口香糖，迫不及待地剥去青绿的表皮，就送进嘴里嚼。鲜嫩茅针，进嘴嚼嚼就秒变成“饼”，牙齿磨出的“草浆”也自然而然地流进肠胃，那种凉凉爽爽、甜丝丝的味道回味无穷，令人难忘。

村里老辈人说，茅针有“滑脂、明目、清热、利尿”之功效，多半依据《神农本草》记载得来。《神农本草》之“本草”，即“草根草”的意思，自然包含了茅草。《中华本草》《中国药典》等均记载了茅草根的药用和食用价值，却没交待“茅针”的“特殊功能”——除口臭。“吃茅针除口臭”，如此腾

越，也使我们没有零食、游戏的童年很快乐。

跟抽草芯相比，掐刺藜存在一定安全风险。似草的嫩刺藜虽不能伤人，但它由一种茎秆密布满鱼钩般倒刺的蔓状与攀援状藤本植物所“生”，此藤一般长于水田后埂、竹棵荡里、河（溪）边高埂，其藤越老、针刺越锋利，“刺藜”之名由此而来。初生刺藜外呈紫红色，嫩茎绿色，老茎灰褐色紫红色，后逐渐变绿，和月季花茎秆相似。刚会跑时，尾随母亲去菜地，母亲指着一垄马铃薯后埂藤刺上长出的紫红色嫩苗说，那叫“刺藜”，剥皮吃甜丝丝的。母亲没说完，馋嘴的我就顾不上顾地把小手往刺堆里伸。

结果小手被钢刺扎了几下，也没掐到一根。母亲见状过来帮忙，实际是传授一种脱险方法，她用锄头勾住刺藜往身边一带，紫红色且包皮未破的刺藜便脱离老刺庇护，伸手轻轻一掐就大功告成。母亲还忠告，皮破的刺藜或被虫叮咬过，必须防患于未然。此后掐刺藜，不仅“挑肥拣瘦”，也很少被刺扎。与草芯有嚼劲不同，剥皮的刺藜茎干亦嫩、汁液丰沛、鲜甜润滋，一口咬下，顷刻间清甜满嘴……后来掐得多，就带回家，与同龄孩子分享。

茅草、藤刺都是一种低等原始物种，没有高贵的遗传身世，却在每年春天馈赠给我们绿色健康食品，虽没尝草芯刺藜已多年，但它们的味道、气息似乎有了生命，有了形状，总在我身边游动，从我的嘴里、鼻孔钻入我体内，与我的思绪混合在一起。春天陷入这些纯天然小零食怀旧情绪时，内心常常感到温暖。

风景与风情

李力

可可托海的广场上
电视大屏幕，反复播放
春晚那首网红的歌

人群驻步观望
有人倾听，有人伴舞，太多的人跟唱
歌声悠扬，配合着这里的风景

忧伤的唱词使空气凝重
不远处蓝天的云，洁白而安静
像是一片片肥美的羊群

有人提醒我
这里没有牧羊人和他的爱情
这里只有美丽的风景

王琪的歌
给可可托海带来爱的风情
每天的游客成千上万地增长

从可可托海到那拉提
“看”见的是驼铃声，“闻”到的是养蜂女
爱的风情远胜过美的风景



天安门

篆刻：陈永春



十鹿九回头的地方

张金贵 摄

華
風

张斌书

母亲第一次独自出“远门”

骆关敏

1988年上海爆发“甲肝”，我也不幸住进了当时在闸北区的上海市传染病医院。住院一星期后由于病情变化的缘故，每次用餐，食物入肚没多久，就上吐下泻，加上条件所限，医院的病号菜，品种单调味道不佳，故而没有一点食欲。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几顿不吃，走路脚在打飘。我平日喜食面条，就尝试着下卷子面放些青菜吃，一顿连一顿，勉强地对付着。

母亲从我的哥姐那里，知道了我的病情以及饮食情况后，心里焦急。第二天一早就去了菜市场选购食材，母亲知道我平时喜食花生，就精心烹制了一瓶肉丁花生酱，想给我作为面条的浇头，改变一下口味，增加一点食欲和营养。哥姐当天工作忙，没时间给我送酱，可母亲送“酱”心切，哪里等得了啊。

那天下午我正与病友闲聊着，冯护士长在病房门口朝着我喊了一声：“8-5（我的床位号是8室5床），你母亲来看你了。”我激动与惊讶交织，只见母亲提着一个黑色的尼龙袋，走到我床前，隐含着泪花的双眼盯着我仔细瞧着，嘴里喃喃地说道：“人瘦了，人瘦了。”母亲边说边从袋子里拿出一瓶还有余温的肉丁花生酱以及十多个咸鸭蛋。我出于对母亲路上安全的担心，内心感激但带有点责怪的气语说道：“你怎么会独自来医院，怎么找到的？这一路多令人担心啊，我在医院都挺好的呀。”

母亲一个人来医院看我，真的出乎我的意料。母亲时年70岁，身体虚弱，年轻时要照料父亲及我们兄弟姐妹六人，整天被家务缠身，只能放弃外出工作的机会，在“扫盲班”学的那点文化，也因很少使用，而慢慢地淡忘了。平日里，她独自外出，也就是以周边菜场、南货店、粮油店为主，如有事去稍远的地方，都是由我们子女陪同的。

母亲从家来医院，需乘公交车，下车后至少要走十多分钟的路程，而且要七拐八弯好多条马路，这每一条马路对于母亲来说都是陌生的，路牌又识，医院是坐落在偏僻冷清的小马路上，不好找。离家好几公里，母亲是否顺利？问她，她只说了两个字：“还好。”

事后我知道，母亲为了尽早把肉丁花生酱送到医院，瞒着家人远行，从公交车下来后，走了好几段冤枉路，她不断地问路，不断地求助，才好不容易找到了医院。对母亲而言，这真的是个奇迹。母性的伟大、母爱的勇敢，成就了母亲独走“长征”啊。

那天我好想把母亲送到医院大门口，甚至公交车站，却不能（医院有规定，甲肝病人不能出自己的病区），只得在病区门口停下了脚步，再三叮嘱她：“路上慢走小心，回去乘车的路记不住，多问问路人。”母亲不住地点头，叫我放心。目送母亲微驼的背影慢慢地消失，我强忍的眼泪终于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征文选登

父亲的党费

刘向东

父亲住进康复医院后，每年的党费都由我去居委会代他交纳。可每次去探望父亲，他还要过问。似乎唯有党费二字仍然在他那逐渐衰老的脑子里活跃着，只要一见我，就会骤然闪出而目光熠熠地反复叮嘱。

初识父亲的党费，是上世纪70年代家住松江天马山部队营区的一个星期天。这天下午，我见腰扎皮带斜挎手枪的父亲一个人在办公室里伏案写字，本想去寻找新一期的《解放军画报》，可发现对面政委叔叔的桌子空着，就油然闪出一个念头：应该在父亲的眼皮下写作业呀。他见我认真做功课，我开个口兴许就能要上一毛钱，就不能买回电影连环画《奇袭》了吗？一番盘算，我很快拿来了课本和本子，当着父亲的面“认真”抄写毛主席诗词，还故意翻动课本弄出响声，好让父亲注意我的“用心”。然而，父亲似乎识破了我的小计，只埋头写着。而他手中笔尖的沙沙声仿佛《奇袭》里的紧张响声和镜头，驱使着我鼓足勇气又拐弯抹角地对父亲

说：“《奇袭》里的志愿军可真勇敢，要是再看一场就好了。不过，新华书店倒有《奇袭》小人书了。”但父亲毫无回应，也没抬眼光顾我局促不安的期待，而是下意识摸摸左胸毛主席像章下的衣袋，又聚精会神地写了起来。正当我按捺不住想再开口时，一声响亮的“报告”堵住了我的嘴。进门的是我熟悉的文书叔叔。只见他立正敬礼：“首长，我来收党费！”说完递上贴有剪纸红五星和写有党费红字的大信封。父亲放下笔肃然起立回礼，从衣袋里掏出一毛钱恭敬地放入信封后又和文书互相敬礼。我看着转身而去的文书叔叔，再看看父亲近乎冷漠的眉宇和埋头写字的专注，蓦然意识到原先的念头已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当时，我第一次听到“党费”的名称，不知是什么意思，也没敢多问。但父亲把钱放入“党费”信封时的恭敬和与文书叔叔互敬军礼的情景，让我顿然感到这“党费”一定非同寻常。尤其是父亲那庄重的神情更令我“对党费”生出一种特别的亲

切和敬意。后来，我不仅明白父亲是共产党员，党员就要按时交纳党费，而且还知道除了交党费，父亲从不多花一分钱。省吃俭用余下的钱要寄回老家用于奶奶和叔叔治病，要么就接济困难的乡亲。自那以后，我再也不向父亲讨要零钱买小人书了。

记忆中，无论是父亲转业担任党委书记，还是退休在家，都始终不忘党员的称呼和身份。在他眼里，社区的党支部组织生活、治安巡逻、志愿者服务等活动都是头等大事，决不能有丝毫的落后和马虎。有一次，父亲带头为四川地震灾区捐献“特殊党费”，母亲嫌他捐多了就奚落了几句说他是“瞎积极”。父亲理直气壮地说：“不积极，还算是党员吗？”

2015年春节间患病的父亲又不幸跌跤骨折，手术后住进了康复医院。有天，护工阿姨来电叫我去趟医院，具体啥事也没说明。等我冒着百年未遇的高温心急火燎地赶到医院时，平日卧床的父亲居然端坐着轮椅在走廊里，翘首以待地等着我。他一见我就凑近说：“听说党费要调整，你去居委会问问我交多少，要按规定办。”他怕我耽搁，还再三催促我早点去询问。

两天后，我把党费收据交给父亲，他抖抖索索地拿着直愣愣地端详了好一阵子，才点头微笑，放心了！